

# 钱锺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

杨 绛



杨绛与钱锺书

一九三九年暑假,锺书由昆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,打算过完暑假就回校。可是暑假没过多久,他就接到他父亲来信,说自己年老多病,远客他乡,思念儿子,又不能回沪。当时他父亲的老友廖茂如先生在湖南兰田建立师范学院,要他父亲帮忙,他父亲就在兰田师范任职,并安排锺书到兰田师范当英文系主任,锺书可陪伴父亲,到下一年暑假,父子俩可结伴同回上海。锺书的母亲、弟弟、妹妹,连同叔父,都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。有锺书陪伴他父亲,他们都可放心;锺书由他父亲的安排,还得了系主任的美差。这不就完善得“四角俱全”了吗?锺书不是不想念父亲。但是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,他正希望不负母校师长的期望,好好干下去。他工作才一年,已经接了下一年的聘书,怎能“跳槽”到兰田去当系主任呢?他又不想当什么系主任。即使锺书这么汲汲“向上爬”,也不致愚蠢得不知国立清华大学和湖南兰田师院的等差。不论从道义或功利出发,锺书决没有理由舍弃清华而到兰田师院去。锺书没有隐瞒他的为难。可是家里人谁也不不理睬,谁也不说一句话,只是全体一致,认为他当然得到兰田去,全体一致保持严肃的沉默。锺书从小到大,从不敢不听父亲的话(尽管学术上提出异议),他确也不忍拂逆老父的心愿。我自己的父亲很“民主”,从不“专孩子的政”,可是我们做儿女的也不敢违抗父亲。现代的青年人,恐怕对这点不大理解了。锺书表示为难,已有倔强之嫌;他毕竟不敢违抗父命。他父亲为师院聘请的人,已陆续来找锺书。他父亲已安排停当;找这人那人,办这事那事。锺书在家人的压力下,不能不合作。可是就此舍弃清华,我们俩都觉得很

不愿意。

我们原先准备同过一个愉快的暑假,没想到半个暑假只在抗衡不安中过去。拖延到九月中旬,锺书只好写信给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,说他因老父多病,需他陪伴,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。(参看《吴宓日记》,第七册七十四页“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,八时三十分回舍,接超[叶公超]片约,即至其宅,悉因钱锺书辞职别就,并谈商系中他事。”)锺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,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。

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。我们等着等着,不得回音,料想清华的工作已辞掉。十月十日或十一日,锺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,和兰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结伴离开上海,同往湖南兰田。他刚走一两天,我就收到沈苇斋先生(梅校长的秘书长,也是我的堂姐

夫)来电,好像是责问的口气,怪锺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。我莫名其妙。梅校长并没来什么电报呀!我赶紧给苇斋哥回了电报,说没接到梅校长的电报,锺书刚刚走。同时我立即写信告诉锺书梅校长发来电报,并附去苇斋哥的电报。信寄住兰田师院。

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发表钱锺书致梅贻琦和沈履(即沈苇斋)信,我没见到过锺书这两封信,值得重抄。钱锺书致沈履信如下:

弟斋哥道察:十月中旬去沪入湘,道路阻艰,行李繁重,万苦千辛,非言可尽,行卅四日方抵师院,皮骨仅存,心神交瘁,因之卧病,遂阙音书。十四日得季康书,公有电相致云虽赴湘亦速复梅电云云,不胜惊悚。不才此次之去滇,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。此中隐情,不堪为外人道。老父多病,思子欲痛,遂百计强不才来,以便明复同归。其实情如此,否则虽茂如相邀,未必遽应。当时便思上画梅公,而怯于启齿。至梅公赐电,实未收到,否则断无不复之理。向滇局一查可知也。千差万错,增我之罪。静焉思之,惭愧交集。急作书向梅公道歉。亦不堪为婉为说辞也……昆明就想依然。此地生活尚好,只是冗闲。不知明年可还我自由否。勿勿不尽。书已专函寄梅公矣。即颂近安

小弟 锺书顿首 十二月五日

钱锺书致梅贻琦信如下: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:七月中旬匆返沪,不及告辞。疏简之罪,知无可道。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,传教有日,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。岂料人事推排,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。九月杪屡欲上书,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,吾师及芝

生师栽植之恩,背汗面热,羞于启齿。不图大度包容,仍以电致。此电寒家未收到,今日得如书,附第斋先生电,方知斯事。六张五角,弥增罪戾,转益惶惶。生此来有难言之隐,老父多病,远游不能归,思子之心形于楮墨。遂毅然入湘,以便明年侍奉返沪。否则熊鱼取舍,有识共知,断无去滇之理。尚望原心谅迹是幸。书不尽意。专肃即叩 钧安

门人 钱锺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

致沈履信所说“十四日得季康书”,当是十一月十四日,钱锺书到达兰田师院的日子,因为他路上走了三十四天。给梅校长信上的“今日”,当是泛说“现在”。他跋涉一个多月到达兰田,方知梅校长连着给了他两个电报。他不该单给叶先生写信而没给梅校长写信,这是他的疏失。梅校长来电促他回校,实在是没想到的“大度宽容”。不知前一个电报是由谁发的、什么时候发的。我们确实没有收到。不知校方是否查过这个电报的下落。第二个电报偏又迟到了两天。如果锺书及时收到任何一个电报,他是已经接了聘约的,清华没解聘,他就不能擅离本职另就他职。他有充分理由上禀父母。他可以设法去看望父亲而不必离开清华。命运就是这么别扭。工作才开始,就忙不迭地跳出去“高升”了,不成了一个“为德不卒”“有始无终”的“小人”吗!锺书所谓“难言之隐”“不堪为外人道”的“隐情”,说白了,只是“迫于严命”,而锺书始终没肯这么说。做儿子的,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,而且他自己也确是“毅然入湘”。锺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离开了西南联大。

(选自《杂忆与杂写(增订本)》三联书店二〇一〇年七月版)

一九二八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,亲戚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。打那以后,他和父亲经常在一起,背着母亲商量事情。那时我才十二岁,许多话听了似懂非懂;但却感到新鲜有味,什么共产主义,革命,暴动,打倒地主和劣绅,夺取红枪会的领导权等等。有一天晚上,我已经睡下了,忽然,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。母亲不住地唠唠叨叨说:“你参加那些红党,不顾家,也不管孩子啦。”父亲说:“谁说不管,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孩子们。”我爬起来问父亲什么是土豪,他没好气地说:“快睡你的觉,小孩子打听什么。”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红枪会。我看许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,挺好玩,也就跟着参加了。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,一天到晚东

海,你快去看看,你爸爸到哪儿去了。”我跑出门一看,只见很多人;扛着校徽拿着刀,向姓吴的地主家里捆去。华高走在前面,很快就把姓吴的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。有人爬墙进到院子里,打开了大门,外面的人端着校徽,举着大刀,一拥而进。不一会儿,把姓吴的地主拖了出来,拉上了后山。接着又把底铺子的恶霸华早、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。人们都在议论纷纷,说:“好,革命了,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维埃埃。”我到处找父亲,可是哪儿也找不着,于是就大声叫喊。华高跑到我跟前说:“你爸爸一会儿就来了,走,我们到祠堂去吧。”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。到三更天时,父亲和来合云、朱文焕从大吴家回来了。来合云说:“明天成立苏

府、土地委员会、妇女委员会、儿童团、少年先锋队等红色组织;红枪会改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二团。华高当了团长,父亲是党代表。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了。打地主的寨子,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了。

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。我年纪小,个子矮,生怕人家不要,处处尽量装着个大样。父亲在前面走,我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,跟在后面。一路上,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。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了,只好踢踢踏踏地跑一阵撵上去。父亲听到这踢踏的声音,就习惯地回头看看我,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着他。开始还可以,以后越走越吃力,父亲终于开口说:“你快给我回去吧,跟着一路

兵团还在睡大觉,打了几枪,他们就吓跑了。团部就留在这里。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。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做饭,我帮忙烧水。到柴堆上去拉柴火时,一拉,发现了一根皮带。这是什么皮带呢?顺手拉出来一看,原来是支汉阳造步枪。我真高兴极啦。中午,华官、文谋给部队送饭时,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,我也跟去了。到了那里,华高团长看了枪,笑着对我父亲说:“好,我们团又多一支钢枪了。”父亲要我回团部去,把枪留下,我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我不服从命令,要揍我,我才吓走了。

一九二九年春天,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驻下,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扰乱根据地。这时部队已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支

## 我跟父亲当红军

吴华奇

奔西跑,开会叽咕事情,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。 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,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(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)。母亲连忙端上饭来,父亲把饭推到一边,戴上帽子,又向外走去。母亲和我都很奇怪,也不敢问出了什么事,坐在家等着。一直待到快二更天,也没见父亲回来,妈说:“小

维埃。”我连忙跟着问:“什么是苏维埃?我们现在是不是共产党?”来合云说:“苏维埃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。好小子,你想当共产党吗?老子是共产党,儿子大概不成问题吧!”说着一把把我抱起来:“小家伙不简单,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?”我说:“共产党是打地主的。”来合云笑了。

第二天成立了乡工农民主政

不够垫脚板的。”我鼓鼓嘴,就是不回去。他沉下脸,说:“你非给我回去不行!”我一看拗不过他,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。走不多远,趁他不注意,又钻到队伍里。过了一会,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,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,而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。我干生气,没办法,蹲在路旁,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走过去,真急死人。忽然有人叫父亲到前面去,我又趁空钻进了队伍。

这时大雪飘飘,风也吹得挺紧,人人都耸着肩,缩着头。约摸快到中午,父亲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,又发现了我。他还是赶我回家。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。他看没法,就从我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。我嘴里说不冷,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像刀子割,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。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:“你到前面去吧,我来招呼他。”父亲瞅了我两眼,就到前面去了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,部队到达八里区南村,准备对龙盘寨、李山寨进行包围。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时,天刚拂晓,

步枪,上级又发来两支掰把枪,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。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,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,不知道有顶膛火,一拨弄,“啪”的一声,把老百姓的一条老黄牛打死了。我吓得要死,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。司务长是个老成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。我干生气,他看我吓得那个样,又好笑又好气地说道:“你们这些小鬼呀,光给我找麻烦,你知道,赔老百姓一头牛要十四块光洋。”说着就找老乡去了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,父亲回来了,一听此事,可发了大火,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,又把我关起来,不给饭吃,非要我回家不行。虽然脸上火辣辣的,但我却不哭。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,从来不喜欢看哭鼻抹泪的人。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:这一下糟透了,如果真派人硬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?正想着,华高团长来了,他训了我几句,叫我以后千万听话,就把我放了出来。这下我可高兴啦,急忙又去烧水。谁知一锅水没烧开,父亲又来找我了。他气呼呼地说:“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

悄吟和二郎(注:萧红和萧军)来到上海,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,手中仅有的几个钱很快使用完了。写出的文稿无处发,寄给鲁迅先生的稿子,什么时候发出来也在不可知之数。没有任何经济来源,坐吃山空,他们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。怎么办呢?办法只有两个:一个是想求鲁迅先生给介绍个工作,这是长久的安身之计;另外一个向鲁迅先生求借,以解燃眉之急。关于介绍工作,鲁迅先生回答得很干脆:“工作难找,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。”关于借钱,鲁迅先生也回答得很干脆:“我可以预备着的,不成问题。”鲁迅先生嘴里这么说,心里却想着要当面考察一下这对年轻人。于是,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先生给萧军、悄吟写了如下这封信:

刘 悄 先生:

本月三十日(星期五)午后两点钟,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?小说如已抄好,也就带来,我当在那里等候。那书店,坐第一路电车可到。就是坐到终点(靶子场)下车。往回走。三四十步就到了。

此布,即请 偏安。

迅上十一月二十七日 接到这封信,像在青岛接到鲁迅先生的第一封信时一样,又激起了这两位年轻作家火一样的热情。他们就像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又将一下子见到母亲一样,他们想象着母亲现在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。他们把两个脑袋紧紧地贴在一起,共同在想象中描绘着鲁迅先生的容貌、仪表、风度。悄吟孩子般地问:“三郎,你说鲁迅先生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?”萧军像早就认识鲁迅先生似的,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高个儿!那还用说,顶天立地大丈夫吗!”大概悄吟对萧军的话是确信无疑的,她没半点儿不相信或想争议的意思,便又孩子般地问:“你说先生是胖子还是瘦子?”这回萧军边说边说:“胖是不会太胖,因为先生说过,他吃的是草,挤出的是牛奶!”悄吟猛搔了两下萧军的脊背说:“你可真会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!”两个人就这样兴致勃勃地瞎猜一气,又把信展开来,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着。读完,萧军抚摸着悄吟的留海儿,像慈父般地说:“小孩子,就知道傻高兴,还不知道靶子场在哪儿呢!”说着便去拿他们一到上海便买来的市区交通图,悄吟却说:“看那没用,先生告诉得明白白的,坐一路电车,坐到终点就是靶子场,再往回走三四十步,见到书店就是了!”萧军一听,觉得真是那么回事。便破颜一笑说:“人的聪明说不上在哪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!”悄吟有些骄矜地说:“如果这个人真正是个聪明的人,那么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表现出来!”萧军又服输似地说:“你说的对,你说的对,你是真正聪明的人,你是真正聪明的人!”

二人不再逗嘴,又谈起那封信来。

十一月三十日,是上海难得的一个冬日的晴天。虽然风里仍含着水雾似的湿气,但是晴空的太阳却给这冬日带来了异样的温暖。悄吟和萧军要去会见他们久仰的一位伟人了,换换衣装吗?按常理是应该换换的。因为衣装可以表明一个人的身份,给人留

下第一印象,它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俗话说:“远敬衣帽近敬财吗!”可他们身无分文,囊空如洗,他们不是正在向鲁迅先生借钱吗?用什么来打扮自己呢?他们这样想了一阵,说了一阵之后,萧军说:“一个流浪人,怎么能像阔人家的少爷、小姐那样?原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吧!这样给先

## 一见永固 师生情

萧军萧红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

李重华



萧红与萧军

生的印象就更真实。”悄吟也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像萧军所说的那样。于是他们都仍穿着从青岛来的那身“粗野得可以”的装束,于下午两点,准时来到了鲁迅先生指定的见面地点。

几天来,他们就共同想象着鲁迅先生的形象,悄吟完全相信萧军所说的是完全准确的:先生一定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形象。可是一见面,两人都惊讶不已: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,面目清瘦,唇上留有厚厚的络黑胡子的老人。若把他身上新着的黑长袍换成短袄,和他此刻脚上穿着的青帆布胶鞋一配,简直是个道道地地的乡下老头!但这两位伪满洲国来的年轻人又细细打量了一番之后,觉得他们刚才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:先生两眼的神采是逼人的,看

人,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。因此,使这两位年轻人又敬畏地出了一口长气。先生手里拿着一顶旧毡帽,腋下挟着一个黑绸子印花的布包袱。见面之后,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,鲁迅先生便把这两位年轻人领出了内山书店,来到了一家小吃茶店。这家小吃茶店设在老靶子路,只有门面一间,在门面里面设有客座,座位不多,时常很安静,加上光线也不充足,显得有些冷清。这是鲁迅先生约会客人的固定地点。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,是这里的老板是犹太人(或许是白俄人),对中国话听不太懂的。他们坐定之后,鲁迅先生先关心地询问他们来上海住得习惯不习惯,没等悄吟说,萧军便抢先说:“就是觉得冷一些。北方的冬天虽然比这里要冷多了,但屋里暖,有炕,有炉子,城里有暖气。上海不同,外边怎么冷,屋里就怎么冷,所以有时觉得比北方冷。”鲁迅先生深深吸一口烟说:“北方靠外界给身体取暖,南方不一样,得靠自己身体给自己取暖!”萧军和悄吟都感到奇怪,不知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,但初次见面,又不能唐突贸然去问,只得等待先生回答。先生一眼看出了两人的疑惑,便朗朗地笑着说:“吃辣椒!吃辣椒有时会辣得额头冒汗,全身自然跟着也就暖了!”悄吟和萧军先笑起来,鲁迅先生又跟着笑起来。正笑着,许广平先生携海婴进来了。鲁迅先生把许广平和海婴介绍给萧军和悄吟。悄吟第一眼看见许广平那高高的个子,便一下子想起了那死去多年的母亲。是许先生高高的个子还是她的模样?不知怎么悄吟觉得许先生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。她仔细打量着,觉得越打量越像,于是低下了头。海婴这孩子也许是这吃茶店的常客,全不把客人放在眼里,围着桌子转起来没完,不时地和爸爸、妈妈说着话。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,萧军和悄吟一句也听不懂。

悄吟和萧军同鲁迅先生的一家,就这样相识了。悄吟给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留下的印象:道地的满洲姑娘,她那小时候特别睡出的平平的后脑勺,突出了满洲姑娘的特征。另外,使他们难以忘记的,就是悄吟那苍白的脸色,还有那过早出现的花白的头发。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:悄吟是一位经历不凡的女性。

初次见面,双方都觉得无更多的话好说,避前信之意,鲁迅先生递给萧军二十元钱,萧军和悄吟当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因为他们切身的经历是:在哈尔滨时常常求借,但朋友的十元钞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欢乐,就仅仅那么一次!常常是借到一元钱的时候都很少很少啊!多数是几角钱几角钱地借……而鲁迅先生和他们第一次见面,就慷慨解囊,为他们拿出二十元钱,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。鲁迅先生那瘦小的身躯,在他们的眼前立即变得高大起来,而且越来越大,顿时顶天立地,遮住了他们的视线,使他们此刻的眼中只有鲁迅先生的形象,其他所有一切都被这高大形象挤得无影无踪……

从此,作为虔诚的弟子,萧红和萧军神奇地闯入了鲁迅先生的生活中。

(选自《只有香如故》哈尔滨出版社出版)



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(左)、政委任弼时(右)、副政委向应(中)

十个小鬼在一起,除了行军,就学文化、上政治课。什么是阶级,穷人为什么穷,富人为什么富?这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,很深地印在我脑子里,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信念。

一个多星期后,父亲和来选刚同志一道来找我,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方,到光山县东区去工作,要我同他一道回去。我说:“你回你的,我是不回去。”父亲说回去送我上学念书。我说:“不,这里人多热闹,我们每天也都在学习,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红军这个大学校。”他看我很坚决,也就不再劝我,但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。我说:“爸爸你回家,我会好好干,放心吧。”他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,拿出刚买的一双布鞋,亲手给我穿上,摸着我的头,又看了看我的话,说:“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的话。”我嗯了一声,不知怎的哭起来了。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,但

是没掉下来。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了几句话,就走了。从此以后,我再没有看见过父亲。

一九三二年,我在河口战斗

中负了伤。到罗山休养的时候,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。一九三六年,我随红军长征到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,就到处打听父亲的去向。后来见到了熊松松、吴华江两同志,他们才告诉我,父亲在豫西牺牲了。

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,就偷偷地跑到村外,坐在一棵大树下哭起来。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,回头一看,是党的总支书记。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,他却把我按住,坐在我身旁,用手抚摸着我的头,劝慰我一番,然后告诉我:“不要哭,我手中有枪,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!”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说:“回去吧,同志们都在等着你。”黑暗中,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善心的领导同志走回部队。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,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!父亲倒下了,党把我抚育长大成人了。

几天以后,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,踏上了征途,沿着我的父亲没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!

(选自《星火燎原全集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)